

# 五四时期的互助思潮〔\*〕

——以《星期评论》为中心的研究

杨宏雨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五四时期,互助思潮在中国兴盛一时。当时由国民党人创办的《星期评论》也是该思潮的助推者。《星期评论》连续7号刊载克鲁泡特金的《国家论》,并在13篇文章中多次提及克鲁泡特金。该刊把互助进化论看作科学的进化公例,称颂克鲁泡特金是发明互助思想造福人类的先觉。该刊对互助思潮的介绍主要集中在竞争与互助的关系、互助的好处以及如何建设互助的社会三个方面。五四时期互助思潮的兴盛,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还有互助主义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竞争进化论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及社会主义的魅力、国际联盟的成立对人们的误导等因素。正确认识五四时期的互助思潮,不可简单地搬用斯大林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敌人”的论断,不可因其受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影响而忽略其探索性、进步性,不可忘记这一思潮对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助推作用。

〔关键词〕《星期评论》;克鲁泡特金;互助思潮;互助之道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11.015

五四时期,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互助思潮在中国兴盛一时。当时,不仅《进化》《互助》《平民》《民钟》等无政府主义刊物大量刊载、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学说,而且《新青年》《东方杂志》《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非无政府主义刊物也很追捧该学说。<sup>〔1〕</sup>学界过去涉及五四时期互助思潮的研究虽有不少,但重心大多放在了工读互助团的实践上,对引发工读互助实验的互助思潮往往一笔带过。有鉴于此,笔者以《星期评论》上的相关资料为中心,对这一思潮作些深入

的探讨。

## 一、克鲁泡特金:发明“互助”造福世界的先觉

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在中国社会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甲午战败后,严复“腐心切齿”,遂“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不久,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第一、二章,取名《天演论》。这是赫氏宣传、阐述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采用意译而

作者简介:杨宏雨,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星期评论》研究”(16BDJ052)的阶段性成果。

不是直译的方法,并加了不少按语,发表自己的看法。《天演论》出版以后,达尔文的竞争进化学说不胫而走,“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sup>[2]</sup>对于《天演论》及其宣传的生存竞争学说在当时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描写道: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和儿女的名字。<sup>[3]</sup>

从甲午战败到五四运动,前后不过二十多年,中国的社会思潮从“竞争”一变而走向了与其对立的“互助”。这种变动从《星期评论》对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的推介中可以得到验证。

首先,《星期评论》从第36号开始,连续7号(36—42号)刊载徐苏中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国家论》,却没有刊载过达尔文或其他竞争进化论者的任何作品。

其次,除了连载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外,《星期评论》还先后在13篇文章中合计提及克鲁泡特金20次——第6号(1篇1次)、10号(1篇1次)、15号(2篇2次)、16号(1篇1次)、20号(1篇2次)、26号(1篇2次)、34号第2张(1篇1次)、39号第1张(1篇1次)、39号第2张(1篇1次)、40号(1篇4次)、42号(1篇3次)、47号(1篇1次),却仅在6篇文章<sup>[4]</sup>中提及达尔文16次——第5号(1篇2次)、双十纪念号第1张(1篇5次)、20号(1篇6次)、31号第2张(1篇1次)、31号第5张(1篇1次)、47号(1篇1次)。在提及克鲁泡特金的13篇文章中,没有译作;提

及达尔文的6篇文章中,2篇为译作(第5号的《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第31号第2张的《马克思传》)。无论是提及的文章篇数还是次数,克鲁泡特金都超过了达尔文。此外,在《星期评论》中,“互助”一词出现了260次,并10次出现在标题中;而“竞争”一词仅出现121次,2次出现在篇目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五四时期,克鲁泡特金及其互助进化论在中国风靡一时,迅速取代了达尔文及其竞争进化论的地位,成为中国人的新偶像。这从毛泽东等人在长沙组织的文化书社书刊的销售情况可以略窥一斑。该社从1920年9月9日到1921年3月31日,售出《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达200本,《达尔文物种原始》仅30部。<sup>[5]</sup>

最后,《星期评论》高度称颂克鲁泡特金。沈玄庐把他和勒氏肯<sup>[6]</sup>、马克思并列,称其为“大学问家”“先觉”,认为他们发明了“互助”“这种造福世界的主义”。<sup>[7]</sup>戴季陶把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赞扬“他们为了多数人的自由,‘地位’‘财产’都抛了出来,去信奉那‘公众的所得应该公众享受’的道理”,是俄国“革命思想的先觉”“人道主义的精神代表”。<sup>[8]</sup>而同一时期,《星期评论》在提及达尔文时,除了肯定他在生物进化论上的功绩,并无其他赞美之词。沈玄庐曾用“分工种田”与“分头抢米”来说明互助与竞争的优劣:“互助如分工种田,竞争譬如分头抢米。大家抢米,米抢完了,大家饿死。田是年年可种,年年有收,种不了,吃不完,就断断不会饿死。”<sup>[9]</sup>

## 二、互助:科学的进化公例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对西方优势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阶段。到五四时期,中国人把西方的长处归结为科学精神与民主文化,当时国人对科学与民主的崇拜心态,在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展现无余。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sup>[10]</sup>

互助论的盛行与五四时期这种尊崇科学、科学至上的理性精神是密切相联的。当时,中国人认为与达尔文的竞争进化论相比,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更科学、更合理。

《星期评论》上刊载的第一篇批评达尔文竞争进化学说的文章,是皮尔逊著、戴季陶译的《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在该文中,皮尔逊说:“‘适者生存’是进化的一个原理。照达尔文学说,适者生存的原理,都是靠着‘雌雄淘汰’‘食料争斗’两个法则来行的。从动物界的发达看来,这种法则,我们很容易承认。拿来说明人类进步和人类制度的变迁,似乎理由不充足。”<sup>[11]</sup>显然,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用竞争进化论来解释人类进步、发展的历史,并不十分科学、合理。而这正是从竞争进化论过渡到互助进化论的思想基础。

林云陔指出,与竞争进化相比,互助、合作进化更科学、更合理。他从四个方面讨论了互助进化论的科学性问题。(1)“竞争不是生活的公例,只是死了的”,换言之,竞争进化论研究问题不全面,只考察了“死了的”、被淘汰了的种群失败的原因,没有看到活着的、保存下来的种群成功的原因。(2)“互相帮助,是走兽生活的公例”。互助理论基于克鲁泡特金对动物界,特别是高等动物的观察,是对竞争进化论的纠偏。克鲁泡特金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在各种走兽中,时有战斗的,时有绝灭的。但在同一种类中,尤以在同一社会中,互相维持、互相帮助、互相保卫的,社会的能力亦断不至比天演公例所许的竞争

不如。”因此,如果说“互相竞争是进化的要因”,那么互助显然也是进化的重要动力。(3)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简单概括为“为生存而竞争”,不符合达尔文的本意。林云陔指出,达尔文在“人的遗产”这一篇中曾说过两段非常重要的话:“在很多走兽社会中,为生存的竞争复推演替代以为生存的结合,看他们如何的替代,演出能力的发达,此能力就可以用来选择为生存之最宝贵的最适宜的状况。”“凡社会的成员最能团结,而又占多数,就能充分发达,并且多子孙。”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把达尔文的理论概括为“为生存而竞争”,并把这几个字称为“进化公例”“进化铁律”,是其信奉者对相关学说“狭义的解释”,这一解释“太过抬高”该学说的适用性,最终必然导致生存竞争原理“因过于敷衍反至失实了”。(4)竞争进化论不符合人类的历史。从历史上看,“那太古时代的人,居处和生活均采共产制度”,“完全不知道有所谓私有财产”。虽然“在部落和部落之间,不免时有战事”,但“在每一部落的里面,通是通力合作的,没有争斗”。据摩尔根推算,如果我们人类社会迄今的历史有十万年的话,那么“至少必有九万五千年系部落共产的制”,换言之,这九万五千年的人类史与所谓生存竞争的天演公例,完全不符。<sup>[12]</sup>

互助协作,是动物界和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许多雌统的生物,如蚂蚁、蜜蜂,他们都是有很严密的社会组织,和正规的分工。”“雁群休息的时候,有几只雁专做警备的工夫,如果有敌人来袭击,任警备的便警醒群雁逃避”。穴居的动物里面,更有“许多分工协作共享果实的例”。<sup>[13]</sup>从人类社会看,分工协作更普遍。在农业文明时代,有夫妻之间分工,“男子治外,女子治内”;<sup>[14]</sup>有兄弟之间协作,“弟兄在生产上皆为家族的协作者,故相互间的要求,只有协作”,<sup>[15]</sup>农忙季节更有大规模的“盘工”:下种、耕耘等,“须用大规模的合作,和他家交换劳力,叫做盘工——就是我先替他人作工,到我用着劳力的时光,他人来还工,反过来,也是这样。”<sup>[16]</sup>到了工

业文明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一件普通的产品,譬如一张报纸,不仅需要“编辑、撰述、采访、校对”,还需要“排字、印字、铸字”等“各种必须的工作分工协作”才能做成。<sup>[17]</sup>无处不在的协作互助现象,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摒弃竞争进化论,认同互助进化论的重要原因。

### 三、竞争与互助的关系

竞争与互助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信奉、倡导互助论,但赤裸裸的现实告诉人们,生活中存在着竞争,而且有时竞争还会以激烈的方式,如斗殴、厮杀、战争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如何看待竞争与互助的关系,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全面认识五四时期的互助思潮,首先要正确认识互助进化论。如前所述,互助进化论是克鲁泡特金等人对竞争进化论的一种“纠偏”,而不是彻底否定和取代。互助进化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凯斯勒(Kessler)说:“我虽不显然否认生存竞争,然而主张促进动物,尤其是人类之发展进化者,互助之力多于互斗之力。……一切生物有两种根本欲望:一是营养之欲望,二是传种之欲望。前者使其互相斗争,互相杀戮;后者使其互相接近,相互帮助。但我相信在有机界之进化中,在生物进步之变化中,个体间之互助,比互斗重要得多。”<sup>[18]</sup>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有一个副标题:“进化的一个要素”,他的基本思想是“互助为一个自然法则和进化的要素”,他希望自己的这一思想可以弥补未被达尔文充分重视的“一个重大的空白”。<sup>[19]</sup>克鲁泡特金不否认竞争在进化中有着重要价值,仅是强调“个人反对整体的斗争不是唯一的自然法则,互助也和互争一样,同样是一条自然法则”。<sup>[20]</sup>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自己考察的有限性——“把互助作为进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来考察”,“考察的不是所有一切的进化要素和它们各自的价值”,并承认自己为了研究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太强调了他们(指动物和人类——引者)的合群性,而对于他们反社会

和利己的本能却几乎没有谈到”。<sup>[21]</sup>

在《星期评论》上讨论竞争与互助关系的是沈玄庐与戴季陶,两个人都作了一篇题为《竞争与互助》的文章来阐述这个问题。

沈玄庐试图从人类进步、发展的历史来探讨竞争与互助的关系。他认为:(1)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从竞争走向互助。“人类最初为个人,最后也为个人。最初所为的个人,是个人的个人;最后所为的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最初为个人的行为,便是‘竞争’;最后为社会的行为,便是‘互助’。”<sup>[22]</sup>人类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物以下无人,人以上无人”,人与人平等互助,共同“对物竞争”,“向利人方面努力精进”<sup>[23]</sup>的社会。(2)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竞争与互助都不断扩大的过程。人类社会以往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个人与个人竞争、血族和血族竞争、部落和部落竞争、国家和国家竞争四个阶段。“个人、血族、部落、国家”,竞争的范围“层层扩大”,同时内部的互助也随之扩大。(3)在国家消亡以前,国家与国家是竞争关系,国家与国民个体之间是互助关系。“要生存,便要竞争;要竞争,便要互助。”这是竞争社会的铁律,同时也是竞争社会的悲哀。个人是组成国家的分子,“个人的发育有需于国家全体”,“分子与全体相互相助,国家不过包容各个人互助的进步,为国家的进步,便是全体的进步。”<sup>[24]</sup>

沈玄庐运用互助理论对人类历史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同克鲁泡特金一样,这个概括显然太强调了理论的完美性而忽略了一些不利的事实。这在理论讨论上当然是允许的,但同时也遗漏了一个应该讨论的内容,即同一社会组织内部个体之间的关系。

戴季陶的讨论从一个发问切入。“无论一个甚么制度,到了将要破坏的时候,忠于那一个制度的人,总是要尽力去保护他。‘保护色’的彰著,就是说明攻击者的势力。这算是竞争呢,还是算是互助呢?”戴季陶的这一发问,实际上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一个制度内部,都有两种对

立的力量存在——破坏者和维护者,当一个制度接近崩溃时,维护者和破坏者的对立、竞争是很严重的。而此时,这一制度对外的竞争力肯定是很有限的。因此,戴季陶提出:“对内是说不到互助,对外也说不到竞争。”<sup>[25]</sup>“最能互助的,最是最适于生存的,就是最能竞争的。拉努珊<sup>[26]</sup>氏说:‘为生存的竞争,为竞争的共同。’这两句话不像达尔文那样高唱‘竞存’,也不像苦鲁泡特金那样专说互助是主要的功用。把竞争和互助这两个向心离心的原则,都能表现出来,不单在生物学上是一个很大的功绩,就是在伦理学上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真是不能互助的,一定不能竞争;一定不适于生存。”<sup>[27]</sup>

同样是讲“要生存,便要竞争;要竞争,便要互助”,<sup>[28]</sup>沈玄庐的讨论着眼于国家与个人关系,而戴季陶关注的则是同一个共同体内部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这一角度看,戴季陶的讨论是对沈玄庐的补充。

#### 四、互助的好处

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非常推崇互助思想。戴季陶等人把“自由、平等、互助”并称为民主主义的“信条”,看作现代国家建设所应遵守的基本方针,同时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sup>[29]</sup>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只有按照“‘自由、平等、互助’的真精神”进行,才能求得“国家的统一”和“有秩序的进步”。<sup>[30]</sup>世界只有“废除一切国际的社会的资本主义和武力主义,使一切种族、一切民族都在自由、平等、互助的原则下面,完成社会的生活”,<sup>[31]</sup>才有永久的和平可言。

在《星期评论》上,众多作者从多个角度讨论了互助的价值和意义。

互助是分工的需要。分工可分为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两类。“劳动是人的本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社会分工的存在,使“人类现在和将来的生活,决不是单独劳动、单独生活。必须交换劳动结果之所得,才能完成各个的生活”。<sup>[32]</sup>而这种劳动成果的交流,其实就是一种

互助。从劳动分工看,随着社会的进步,“分工渐趋渐细”,<sup>[33]</sup>许多工作已经不可能由单个人独立完成,有些工作虽然仍可由个人独立完成,但费时耗力,互助合作不仅成为一种必然,而且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人类发明机械、分配工作的程度,日益进步,人类的劳动,也就日益省时省力。”<sup>[34]</sup>

互助增进文化发展。沈玄庐指出:“‘孤陋寡闻’和‘深闭固拒’都是增进文化的大障碍。”要破除这两大障碍,应该发展教育、加强交流。文化的发展,除了要靠“自己发明”以外,学习、模仿他人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文化除却由摹仿性所生的发明性,无从增进。”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看,文化发明可以看作是以文化积累为基础的一种创造性模仿。在文化上“摹仿自己所得未曾有”和“发明了要他人摹仿”,其实都是推进人类文化向前发展的“互助”行为。<sup>[35]</sup>

弱者互助,变成能者、强者。在《星期评论》上,沈玄庐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互助的好处》的小短文,谈弱者互助,有利于大家克服困难,达到单个个体难以实现的目标。

上海南京路中段,电车轨道交叉的地方,要算交通最辐辏了。常常有初到上海的人,或缠足的妇女,到了十字路口,不敢穿过,要叫车子“摆渡”的。一天,我看见三个人一串,纤纤徐徐在那交叉路上走,印度巡捕轮着眼朝他三个人很很注视了注视,四面的车马,正风雨般来,我很替他们三个人着急,一会儿,他们安全地过去了。一看,头一个不过高与胯齐的矮子,第二个是个跛的,第三个还是个双眼失明的瞎子。诸君请把三个拆散了,除却矮子还可以过得去,那个跛的和瞎的,却真是没法经过这热闹关头呵!<sup>[36]</sup>

弱者互助,成为强者,达到共赢,这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互助论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结合起来,强调工人阶级在反抗资本家压迫的斗争中,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帮助。

戴季陶把拉努珊的“为生存的竞争,为竞争的互助”一语和劳工运动联系起来,解释在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中工人实行同盟罢工的重要意义。“‘同盟罢工’这一个名词,说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斗争非常明显,比英文的 Strike 含意还要充分。‘同盟’就是结合,‘罢工’就是斗争的手段。‘为生存的竞争,为竞争的互助’,就是同盟罢工的本意,也就是阶级斗争的本意。详细说就是:‘同盟罢工的目的,是联合同利害休戚、从事于生产事业的工人,对于资本家表示反抗,且加以打击,使其改良待遇工人的条件;或联合同阶级的人,反抗占领生产机关的非劳动者,使其放弃占领和享用收益管理的权利,由劳动者自己劳动,自己管理、自己享用。’”<sup>[37]</sup>“劳动者就个人来看,都是些弱者”,无力和拥有资本、政权的资本家抗争,获得应有的利益,“只有多数的劳动者,一致团结起来,构成一个阶级的势力,以多数的力量,去压伏那些资本家,方才能够成功。”<sup>[38]</sup>沈仲九也说:“工人要和资本家争斗,必须要有阶级的自觉和阶级的团结。凡是一个人的利益,决不能离开阶级的利益而独自保全的。所以要谋各个人的利益,必须和利害相同的同一阶级的人,联合起来,才能得到效果。”<sup>[39]</sup>值得一提的是,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星期评论》的不少作者已经懂得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重要性。李汉俊说:“工人呵!你们的阶级就是你们的国!”<sup>[40]</sup>沈仲九说:“现在的时代,是阶级斗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以为应该合各国劳动阶级的力量,和本国资产阶级斗争,才能打破资本阶级。所以劳动阶级当中,决不当再分什么种界国界。”<sup>[41]</sup>戴季陶也认为“自由劳作、自由管理、自由享用的互助世界”,需要“联合世界上一切被掠夺的人”去共同争取。<sup>[42]</sup>

互助促进社会和谐。戴季陶等人在倡导劳动者团结起来,和资本家斗争的同时,也主张劳资调和,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戴季陶承认“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进化的重要原则,承认自然界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他认

为与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不同,人类社会的进化可以得益于互助——相互妥协,他特别欣赏“社会民主化的英国政治”和英国的“阶级退让的精神”。英国“工人在社会运动上虽有很大的势力,但是一点不滥用他的势力”,政府对于工人罢工,“不压迫他们,不用干涉的态度、威吓的说话”,而是尽量和他们谈判、“协商”,这样,工人方面“也就多少退让一点”,给政府留出解决问题的时间和空间,“免了许多扰乱和流血的悲惨”,<sup>[43]</sup>是一种非常符合社会进步、人道要求的做法。五四时期,中国的现代产业还很有限,劳资对立尚不严重,戴季陶等人希望中国的工人能“保持与雇主阶级的调和”,<sup>[44]</sup>从组织工会、增加工资、提高文化知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待遇等方面入手,理性地开展工人运动,<sup>[45]</sup>同时希望资本家和工商业者觉悟起来,“赶快做工人资本家接近调和的功夫,不好把工人的生活问题当做和自己不相干”,把“工人的教育”“工人的安慰”“工人家族的待遇”“工人的保险”“失业者的救济”等工作,“切切实实一件一件作起来”,以避免将来社会革命的总爆发和残酷的流血牺牲。<sup>[46]</sup>“要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sup>[47]</sup>戴季陶的这一呼喊,包含着他对中国走阶级互助之路,通过和平、渐进的变革达到理想社会的热望。

助人即是自助。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思想。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五四时期,在互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思想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星期评论》关于“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的讨论中,沈仲九一面肯定“女子解放,应该女子自己做起”,另一方面提出“从男子做起,也未始不可。”他说:“男子助女子解放,何尝不是一种互助的行为?”“若因为女子自己没有做,就眼看他,岂是‘人’对‘人’应该么?”男子去做女子解放的事业,一方面是男子“尽自己互助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引动女子自觉自动,使女子得以发挥自己的能力”。<sup>[48]</sup>查光佛认为在中国旧式家庭制度下,无论是男子还是女

子,“都不是社会上共同生活的一个人,只是某的夫,某的妻……男子替女子作牛马,女子替男子作牛马,一生一世,不得开交了。”因此,“女子解放,当从男子解放做起。”<sup>[49]</sup>查光佛关于男女互动、互助解放的思考,大大影响了《星期评论》的同人,朱执信《男子解放就是女子解放》,李汉俊的《男女解放》,都承认男女解放“实在是一个题目,决不是两个题目,是不能够把他们拿来分开的”。<sup>[50]</sup>从女子解放到男子助力女子解放,进而到男女互助、共同解放,《星期评论》同人们在讨论中对互助意义的认识得到了升华。<sup>[51]</sup>

工读互助,构成圆满的生活。戴季陶把工读互助理解为“自体保存的欲望”和“自体发展的欲望”的结合。<sup>[52]</sup>施存统是当时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员,他把工读互助的意义概括为“救济个人生活的枯燥”。他说:“工是劳力,读是劳心”,“劳心劳力,不宜有偏”。工读互助,“一面劳力,一面劳心;终身工作,终身读书”,可以使“身体平均发达”,是真正“人的生活”。<sup>[53]</sup>施存统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有着广泛性和普遍性。上海工读互助团为募捐而撰的介绍说:“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工读互助,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与职业”“生活与学问”的矛盾冲突,为青年人找到一条“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的道路。<sup>[54]</sup>

## 五、互助之道

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不仅极端推崇“互助”,而且还具体探讨了互助之道——如何实现互助的问题。

笃信互助,把互助当公理。朱执信认为,要建设互助的社会,首先要将互助当公理。所谓公

理,就是说它是普适性的,是“没有国界的”,不存在中国的公理、美国的公理、日本的公理等等说法,因为“公理只有一个”。“公理与权利是不同的”,公理是世界主义,权利是“国家本位”。针对当时流行的“强力拥护公理”一说,朱执信指出,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说法,它把公理和权利混为一谈了。所谓强力拥护公理,它看重的是强力而不是公理,它的真正含义是拿强力拥护权利。“拿强力去拥护权利,就会同公理冲突,就会翻身转到‘强力就是公理’的地位”。各国有各国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希望最大程度地拓展自己的利益,但各国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大家都用强力拥护自己的权利,矛盾、冲突一旦不能妥协,必然要进行战争,杀个你死我活,分出输赢高下。把互助当公理,就是把人类共同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拥护全世界人类的公理”,做一个“超国家的世界的人”。<sup>[55]</sup>沈仲九把强权看成公理的死敌,他认为,要“组织新社会,实行互助”,就应该“拥护公理,抵抗强权”,“积极的主张公理,扑灭强权”。<sup>[56]</sup>

明了互助的真义,防止把利用当成互助。沈仲九说:“‘利用’的本质,有两种不好的地方:一种是蔑视他人的人格。凡是要利用人的人,一定预先存一个被利用的人,能够任我利用的念头。这种念头,就是不认被利用的人有独立自由的意志,就是蔑视他人的人格,实在是不应该的。……二种就是依赖性。凡是要利用人的人,大都想依赖他人。如果自己的创造力和独立性很强,那是断断不会想利用人的。”“利用和互助,是截然不同的。互助是光明正大的,人已两利的。利用是阴谋诡计的,损人利己的。”<sup>[57]</sup>

抛弃独善其身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因此,在中国社会,不作为的独善其身主义一直很有市场。譬如民国初年,李石曾、吴稚晖、张继、汪精卫等人在上海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喝酒、不吸烟、不吃肉、不嫖、不赌、不纳妾。戴季陶肯定他们的出发点是高尚的,但认为这仅是一种

消极的做法,没有“从积极上做工夫”,对中国社会产生不了实质性的影响。“既然晓得官僚是腐败的,为甚么不去积极革除官僚的腐败?晓得做议员的有许多是社会国家的罪人,为甚么不到议院里面去增进议员的人格?晓得嫖娼是不好的,为甚么不去把那些娼妓从火坑里面救出来?这样做好人,就算是有多少一生不破戒的同志,也不过是几万万中国人里面多了几个洗耳的巢父。中国的政治,永远不会因此改革的,中国的社会,永远不会因此进化的。”<sup>[58]</sup>互助主义则是一种积极的行动主张,用孔子的话表述就是“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联合起来与不合理、不公平、腐朽、罪恶的社会作斗争。T. T. S. 也说:“我们的周围,充满的是腐败恶劣的‘因袭’。这个‘因袭’的锋利爪牙,一个不当心,就要把我们抓将去。我们在这腐败恶劣的‘因袭’堆中,不是要学‘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最多只能成为一个自命为能独善其身的‘乡愿’。我们是要这腐败恶劣的因袭,做我们恶战苦斗的对象。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的新世界,是要用尽我们自然赋与的最善能力,透出腐败恶劣的因袭,才可以求得的。”<sup>[59]</sup>

注重社会教育,把互助变成国民常识。互助是一种进步的理念,但理念的养成要靠教育,“将新思想散布在能发育的土地上”。学校教育是常规教育,能用“诗文”传播互助的知识和意义,自然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还应该注重社会教育,多多利用“匾额、屏幅、联语以及书春种种”,“凡此种种所发生的影响,要比诗与文普遍。”这样的社会教育,不仅受众特别广泛,而且可以“将他壁上、梁上、门上、扇子上,那些旧字样都刮洗去”,换上符合互助、自由、平等、进步理念的新文字、新话语。这些新文字新话语,不仅可以改变成人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能改变未来社会的主人——儿童的思想。儿童对世界充满好奇,最喜欢问“是什么”“为什么”……,当他们看到壁上、梁上、门上……这些含有新思想新

观念的文字,“自然会要求他父母兄姊的解识。经一度的解识,要比在出版品上宣传的效力大得许多。”<sup>[60]</sup>当互助思想深入到国民的内心,成了常识、习惯,互助的社会自然就容易实现。

重视实践,言行一致。知与行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历代思想家思辨的一个重要问题,代表性的观点有老子的“不行而知”、子皮的“知易行难”、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朱熹的“知先行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魏源的“及之而后知”、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等,除了老子以外,其他的思想家都重视“行”,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在如何建设未来理想的互助社会问题上,沈玄庐提出:(1)言行一致,不能说是一套,做又是一套。例如做教师的不能“讲堂班所讲的一大堆仁义道德博爱互助的话,禁不得下了讲台就去打扑克又麻雀谈嫖经说赌例。”青年学生“模仿性是最大的”,如果教师言行不一,教育的效果不仅微乎其微,而且可能适得其反,“当教师的,费了千日口,敌不过一日手”。(2)行动是最好的教育,“书本上的教育,无非记述过去的运动形迹和研究未来的运动方法;现时的运动,便是改进过去的运动,实行研究的运动。”当时北京的教育界因为当局阻碍教育独立、拖欠教育经费、迫害爱国师生而罢工,沈玄庐盛赞他们联合起来向恶社会、黑暗势力争斗的壮举,指出他们“根据共同的意思,和那些龌龊黑暗的当局奋斗。这就是最善良的、最容易普及的教育”。“教职员集合运动的事,即是表现教职员的社会的态度,和他对于全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青年学生很好的教育,也是全国国民很好的教育,不可当作一时的风潮轻轻看过。”<sup>[61]</sup>

发掘、利用传统文化中的互助资源。由于凯斯勒、罗斯金、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倡导,19世纪末20世纪初,互助主义风行一时,但从思想史上看,互助主义的出现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丰富的思想渊源。就西方而言,如《荷马史诗》中的“依靠相互间的信赖和帮助,能够完成伟大的事业,并有伟大的发



现”；西塞罗的“人世间没有比互相竭尽心力、互相照料更加快乐的了”；《圣经》上“帮助别人的人，必得相助”；“那把食物分给穷人的人，必然蒙福”……就中国而言，墨家的兼爱思想，儒家的大同理想，老子的“即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韩非子的“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有助，不能自举”，等等，都是对互助的倡导和肯定。五四时期，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都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资利用的丰富资源，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提出：“我们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我中国从古以来对于社会组织就是极力排斥‘自利’，赞美‘利他’的。我们如果把中华民族‘利他’的精神恢复起来，把‘科学的精神’来做肥料，我们这样大的一块土地，这样多的人民，真可以做成一个理想的‘平和国家’，理想的‘互助社会’。”<sup>[62]</sup>

努力自省、包容过失、共创美好新社会。互助是一种基于“同情心”的善德。互助的社会是“一个有同情心的热烘烘的社会”，提倡互助的人是“一个有同情心的热烘烘的人”。互助的社会和有互助心的人，应该有“一种襟度”，“对于人家作一件好事，固然要赞美他，就是对于人家作了坏事，也要详细考察他所以作坏事的原因，不好去苛责一个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对那些一时不慎做了错事的人，要让其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万不能断定他是不能为善的人，尤其不应该妨害人家为善的道路”。一个人犯了错，社会不给他忏悔、改过的机会，他只会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个强盗，刑期满了、出了狱，社会上大家仍然当他作强盗，没有人和他做朋友，没有地方容他作工。他没有法子，也只好重新作起强盗来。”要创造自由平等、互助的理想社会，离不开积极的奋斗。这个奋斗，一是向恶社会、黑暗势力斗争，二是帮助那些有过失、能忏悔的人走上进步之路，三是和旧我斗争，努力“做自省的工夫”，“倘若发现自己的罪恶来，就要从光明正大之社会的良心上

下一个决心，切切实实的从否定旧生活里去肯定他的新生活。”<sup>[63]</sup>

自由组合、试验新生活。在如何建设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的理想社会问题上，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已懂得有“组织小社会”与“组织大社会”两种不同的方法。前者是“集合同志，组织理想的小社会，实行新生活”；后者则是“先用群众的、公开的、精神的运动，拥护公理，抵抗强权，然后自由联合无数小社会，组织大社会”。<sup>[64]</sup>在这两种方法中，他们更欣赏第一种方法，这也是五四时期新村主义、工读互助在中国活跃一时的原因。施存统把自己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原因，归结为“试验新生活”和“改造社会”两个方面。当时他们希望“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结果，就是一个顶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的社会。”改造的步骤，“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第二步是扩张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同志，结成一个团体，实行世界革命。”在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上，他们主张在团体建立时，成员要主义一致、情投意合、自愿加入，团体建立后，团员要把团体当成“终身以之”的机构，“凡是团员都该一心一意尽忠于团体；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做到“我即是团，团即是我”。<sup>[65]</sup>

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合作，共同建设互助的新社会。拉来桑说：“教育能增进知识，知识是生存竞争的最重要的武器”，因此应该“使每个人都受充分的教育。”<sup>[66]</sup>在五四时期，这一思想被知识阶层高度重视。李汉俊说，智识阶级“是‘靠脑力的劳动’生活的人”，它的“地位和永久的利害，是与‘体力的劳动者’一样的”，在未来的社会改造中，智识阶级不仅应该注意团结体力劳动者，而且应该十分重视体力劳动者的教育问题，在他们“知识上开发做工夫”，<sup>[67]</sup>启迪他们的阶级觉悟。工人的觉悟是工人团结、互助的前提。倘若“他们没有阶级的觉悟，就是有充分的要素，他们是决不会有发生相互间的同情心、互助观念，有团结、有组织的”。<sup>[68]</sup>戴季陶非常重视

劳动者的教育问题,曾在《星期评论》第三号专文讨论“工人教育问题”,并把文化运动和劳动运动结合在一起,强调“文化运动和劳动运动,是有同一意义的东西,离开劳动是没有文化可言的”。“文化运动的意义,就是使一个经济体里面大多数不得享受文化利益的人享受文化的利益。”<sup>[69]</sup>

## 六、互助思潮兴盛的原因

五四时期,互助思潮在中国影响相当广泛,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受其影响的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还包括文化保守主义者、国民党人、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及像蔡元培、高一涵这样的民主主义者。<sup>[70]</sup>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者包括顾兆熊、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陶履恭、程演生、王星拱、高一涵、张崧年、李辛白、孟寿椿、徐彦之、陈溥贤、罗家伦、王光祈等17人。<sup>[71]</sup>纵观这17个发起者的经历、信仰和此后的人生道路,我们不难看出互助思潮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感染。

不少学者在著述中都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互助思潮兴盛的关系,这一点在《星期评论》上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全世界,很受赞美的欧洲文明,被此次世界大战造出来的荒乱,剥落尽了。<sup>[72]</sup>

这回欧洲大战的原因,有许多人说是商务工业的竞争。<sup>[73]</sup>

此次亘五年的世界大战,是由各资本主义国商品生产堆积所发生的爆发结果。换言之,是以奖励资本竞争为目的之国家组织他们本身所必然发露的破绽。<sup>[74]</sup>

从欧洲大战之后,正是以前受经济所决定的旧环境破坏的时代,以后经济的新环境将要决定的时期。凡是人类都要求适应这个新环境,创造新生活状态,所以大家要收起狠狠的争夺脸子,提起笑嘻嘻的互助精神来做一个人。<sup>[75]</sup>

蒋梦麟、戴季陶把竞争看作是大战爆发的原

因,沈玄庐把互助精神的盛行看作是大战的结果。蒋作宾则全面讨论了“竞争”“互助”两种思潮此消彼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自达尔文生存竞争的学说出现后,数十年来,种族的竞争,比较从前一日更烈似一日。其结果如何,就是演成这回欧战的一大惨剧。但是经了这大大打击之后,晓得世界上的人类,是要互相扶助,共谋生活,才能得到幸福的,不是侵略攘夺,一族所能独霸的。”“从前弱肉强食的主义,要改换为相互扶助的主义了。”<sup>[76]</sup>

从《星期评论》上显示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互助思潮的兴盛,还与以下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1. 竞争与互助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互助进化论不仅符合人们的认知,而且合乎道德伦理,被克鲁泡特金等人揭示以后,人们恍然大悟,转而质疑竞争进化论的真理性。

2. 互助主义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李怡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很明显的“不竞不争”“道德治世”“道德万能”的特点,因此,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将其道德的文化兴趣与‘互助论’相联结”,“这种文化嫁接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道德改造社会’的新武器,在当时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sup>[77]</sup>戴季陶呼吁恢复和发扬中国传统“利他”精神,<sup>[78]</sup>沈玄庐说中国人“只知道有互助,不知道有竞争”,<sup>[79]</sup>施存统等人在进行工读互助实验的过程中,不肯与平民争利,<sup>[80]</sup>这些都证明互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内在联系。

3. 竞争进化论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sup>[81]</sup>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中国需要觉醒、崛起、现代化,才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甲午战败后竞争进化论得以风行一时的原因。但是中国和西方存在着巨大的时代差,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中西之间的鸿沟不可能在短时间填平,因此,强调竞

争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沈玄庐说：“现在的世界，岂不是提倡‘互助主义’的世界吗？世人为什么要提倡这互助主义呢？无非感受互相争夺、杀戮欺凌的痛苦。中国人要算受痛最深的了，应该有实行互助的必要。”<sup>[82]</sup>中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受尽了西方列强的欺凌，反抗无效，一时又难以翻身，碰到倡导互助、友爱的思潮，自然喜出望外，热烈欢迎。

4. 国际联盟被误认为是世界告别竞争、走向互助大同、走向永久和平的先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包括杜绝秘密外交、取消经济壁垒、保障民族自决、建立一个旨在维护国际和平的国际联盟等在内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威尔逊的这十四点和平建议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期望。陈独秀盛赞威氏“光明正大”，是“现在世界上第一大好人”。<sup>[83]</sup>陈氏如此，当时国内绝大多数人也差不多。“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北京政府徐世昌总统、研究系梁启超、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以及西南军阀等，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竞相以威尔逊主义为旗帜”。有充分资料可以证实，威尔逊主义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外来的重要源动力”。<sup>[84]</sup>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依靠美国等西方列强谋求公道、正义非常失望，正如《星期评论》第二号所言：

欧战终结以后，威尔逊大总统提了十四款的信条，和一个国际联盟案，去到巴黎。这时世界上的言论，都是用“和平”“正义”“人道”“民族平等”“人类幸福”的字样布满了。我们中国的国民，被这些极华丽极高尚极优美的名词，迷了个眼睛花耳朵聋，以为世界上战胜的国家，总可以主张世界的公理的。谁想这个凡尔赛会议决议的东西，依然是保障“大国的强权”，依然是扶持“军国主义”。我们这“极大的小国国民”，更失望到了极点。<sup>[85]</sup>

但从《星期评论》提供的其他资料看，这种失望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是失望中有期待而

不是彻底绝望。这从戴季陶等人对第一届国际劳工大会的评说中可以看出，<sup>[86]</sup>从沈玄庐等人对国际联盟的肯定中更能得到证实。沈玄庐把国际联盟的成立看作是人类“宣告竞争終了”，“打破国界的先声”，<sup>[87]</sup>蒋作宾也把国际联盟的成立看作是人类“要废掉国界的起点”，并断言“大同世界，不久总有实现的一日。”<sup>[88]</sup>

5. 社会主义的魅力。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学说虽然纷繁复杂，但按其属性来分，大致可以分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自由主义因其强调个人权利优先、放任资本逐利和市场调节，在儒家文化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真正的信奉者并不多。20世纪初年，正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在欧美劳工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思潮接榫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仁爱观念、家国情怀等因素，迅速在中国发荣滋长。1920年，冯自由说：“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sup>[89]</sup>1926年，胡适把社会主义称为西洋近代文明的新宗教信条，“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sup>[90]</sup>据不完全统计，1918—1922年，中国公开发表过同情社会主义主张观点的约240人，发表过介绍或同情社会主义主张的文章的报刊多达220余种，约占这一时期出版的280余种重要社科杂志、报刊的80%。<sup>[91]</sup>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者力量最大。基尔特社会主义因罗素来华而名噪一时，却又因不顾当时的潮流，把“开发实业”作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唯一之要求”<sup>[92]</sup>而备受指责。克鲁泡特金把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结合，因颇能自圆其说，被人誉为“科学的无政府主义”。<sup>[93]</sup>五四时期中国人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尚不是很清晰，往往将其看作是相似或相通的理论。在《星期评论》上，沈玄庐也把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混同起来，在《竞争与互助》一文中，他写道：“本篇所讲的‘互助’，如苦鲁泡金、

勒氏肯、马克思等,多少大学问家所研究过来的,几位先觉,发明了这种造福世界的主义。”<sup>[94]</sup>

### 七、正确看待互助思潮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五四时期的互助主义被界定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工读互助团的实验被界定为无政府主义影响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证明“实现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慈善事业,不是凭善良的愿望,依靠和平的渐进手段就可以建立新社会、改造旧社会”。<sup>[95]</sup>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对的,但显然又有些简单化。

第一,互助主义是一种善的理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以后,“许多科学与哲学思想的代表者受了达尔文学说(只是片面的解释,并非达尔文的真意)的影响,也开始认定支配世界的普遍法则只有一个——就是‘生存竞争律’,由于此种假定,他们在无意中竟为哲学的无道德论张目了。”<sup>[96]</sup>尼采更是鼓吹生命就是追求权力的意志,他在《善恶的彼岸》一书中说,“权力意志就是生命意志”,“生活本身本质上就是侵占,就是侵犯,就是对外人和弱者的征服,就是弹压,就是严酷,就是强人从我,就是兼并他人”。一个生机勃勃的团体,“它必然变成为有血有肉的权力意志,它要努力生长,赢得阵地,支配环境,取得优势,——这不是因为什么道德或不道德,而是因为它生活着,并且因为生活就是权力意志。”<sup>[97]</sup>这种完全抛弃道德的主张不仅向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哲学提出了挑战,而且公开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主义、殖民主义张目。在此背景下,克鲁泡特金决定要“从科学的见地来证明自然界并不是无道德的”,“道德乃是社会生活的进化之自然的产物”,他的《互助论》就是他道德学说的一个绪论。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和其他一些著述中阐发说:“人的力量在孤独中不能产生,而是由于和同胞、和人民、和劳动群众联合一起而形成的。”“人类的进步是绝对不能和社会的生存分开的。生活在社会中,其结

果就不可避免地使人类与动物生出了社会性的本能——互助;这种本能在人类中便进而发达,则变为慈爱,同情及爱之感情。此等本能与感情生出了人类道德,即道德的感情,知觉,概念之总和。后者在最后形成了一切道德学说的基本规则:‘你不愿意别人加到你身上的,也就不要加到别人身上。’”克鲁泡特金还把互助、正义、自我牺牲看作是道德的三要素,认为“此等要素虽不具有论理律中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之特征,然而却是人类的伦理学的基础。”<sup>[98]</sup>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是和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社会主义的原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的伦理公式便是‘无平等则无正义,无正义则无道德’。”<sup>[99]</sup>正因为克鲁泡特金特别重视道德、伦理,所以他被人尊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科学家”。<sup>[100]</sup>

雨果说:“善是精神世界的太阳。”在一切道德品质中,善良是人类最需要的品质。这不是说善能解决一切问题,也不是说善的理论无懈可击,更不是说善的理论就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教人行善、彰善瘅恶应该是人类的基本准则。

第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包含着不少真理性的认识。《互助论》并不是克氏闭门造车、凭空臆想的作品,“作为他的学说之根柢的乃是那无数客观地搜集起来的事实。作者根据他对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之渊博的知识来处理这丰富的材料。每一引证均注明它的出处,或是生物学者的实验,或是探险家的报告,或是人类学者的记录,或是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都可以用批评的眼光来考察它们。”克鲁泡特金的研究或许有偏颇与不完善的地方,但“互助的学说是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面的”。<sup>[101]</sup>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在科学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互助论》应该说是《人类由来》的续篇”。克氏的思想不是对达尔文学说的否定,而是对“达尔文学说之正确解释”,<sup>[102]</sup>是对达尔文学说中被人忽视的思想的发扬光大。克氏认为,导致生物进化的因素有很多种,<sup>[103]</sup>竟

争是其中的一种,互助也是其中的一种,互助如果不比竞争更重要,起码也和竞争同等重要。克氏关于生物进化的这一见解为许多达尔文的信徒所认同。据说赫胥黎看见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中所提供的证据,后来便改变了自己的见解。达尔文的友人,英国博物学家亨利·沃尔特·贝茨称赞克氏的见解“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sup>[104]</sup>

第三,不宜简单地用阶级斗争学说去否定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众所周知,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sup>[105]</sup>后来恩格斯发现了这一说法的问题,在1888年的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对于阶级斗争学说,笔者不打算在此全面讨论,仅提出以下看法:(1)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学说不是绝对对立的,不能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否定其他人类文明的成果;(2)不能只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忽视他们的其他思想;(3)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可以推论出第三点——不能把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神圣化。过去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的道理简单地归结为一句“造反有理”的提法,就是把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神圣化的表现,其在实践中的错误及其后果众所周知,毋庸赘言。

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显然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一学说积极的反抗意义。《互助论》首先是抗议侵略、抗议强权、抗议那些为侵略和强权辩护的学者及其学说的人道主义作品。其次,“它还交给我们一个斗争的武器,这便是互助。”克氏通过他的学说告诉人们,“互助是最好的武器,无论是用来抵御外敌的侵略或与残酷的自然斗争。能够使用这武器的物种或人类决不会灭亡”。<sup>[106]</sup>在五四时期,“北京政府通令禁止克鲁泡特金《互助论》、马克思《资本论》……等书籍八十余种。”他们这样做,“无非为禁止共产主义、集产主义、无政府主

义的传播。”<sup>[107]</sup>北洋政府之所以要禁止这些学说的传播,无非是因为恐惧这些学说的进步性与革命性。换言之,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等都是作为中国专制独裁政治的对立物存在的,在反对当时中国黑暗政治和腐朽社会的斗争中,它们是同盟者。它们之间虽然有矛盾和斗争,但这属于新文化、新思潮内部的分歧,无碍其反封建、反专制的革命性。

在如何看待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理论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视角。李大钊从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去解读马克思主义,把俄国十月革命看作是“以人道、自由为基础”的革命。<sup>[108]</sup>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标志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sup>[109]</sup>对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李大钊并没有简单地接受一方摒弃另一方。他说:社会主义“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是拿“互助友谊的精神”作基础的。<sup>[110]</sup>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与马克思的“阶级竞争”学说,表面上看“仿佛相反”,但实际上是一致的,是可以合作的。“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sup>[111]</sup>

第四,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是五四时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媒介。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很多人有信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经历。李大钊不止一次说:“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sup>[112]</sup>1917年,恽代英与一些友人在武昌创立互助社,“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sup>[113]</sup>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称马克思为激烈派,克鲁泡特金为温和派,并赞赏克氏的互助论,“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希望中国能以“民众的小联合”作基础,走向“民众的大联合”,把中国建设成“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

界”<sup>[114]</sup>……从《星期评论》提供的资料看,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等活跃在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有学者估计,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各地的几十名党员中,40%以上的人受过各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sup>[115]</sup>中国大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受其蒙蔽”来解释,而只能说明克氏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对年轻人和革命者有着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是和克氏无政府大同理想的美妙、理论的严谨密不可分。从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等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互助进化观风靡五四时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sup>[116]</sup>“许多青年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常常是以无政府主义为过渡的,无政府主义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sup>[117]</sup>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是五四时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桥梁。

第五,要认真考量五四时期中国互助思潮与克鲁泡特金社会互助理论的异同。五四时期中国互助思潮和工读互助运动,从理论来源上看大致包括四个:其一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其二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主义愿景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其三为托尔斯泰的泛劳主义;其四为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仁爱学说。当然不排除还有其他因素,但以这四个为主。在这四个理论来源中,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自然处于首要位置,但从《星期评论》提供的材料看,五四时期,中国的互助思潮与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或者说是有取舍、有发展。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主要是克氏的人群互助理念,反对战争反抗强权的意识,对未来共产大同世界的勾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发展成知识分子要与劳工大众相结合,教育、引导劳动大众,启迪他们的

觉悟,共同为建立理想的互助大同社会而斗争。对克氏提出的工业和农业联合的意见、工业分散和以全工代替分工的主张,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传播。不仅如此,社会分工理论反而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理解和接受互助论的一个基础。

在评价克鲁泡特金时,一定要懂得不可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忘记他是“一个忠实的归纳的科学家,一个前进的哲学家,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想家”,<sup>[118]</sup>不可忽略了其人格的伟大、学识的渊博、眼光的深透、论述的雄辩……;在评价五四时期的互助思潮时,不可因其受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影响而忽略其探索性、进步性,不可忘记这一思潮对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助推作用。这应该成为共识和前提。斯大林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敌人”<sup>[119]</sup>的论断,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经常一起合作,共同反抗资产阶级政府、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不宜简单地到处搬用。

### 注释:

- [1][70]吴浪波:《互助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5-16、21-32页。
- [2]汉民:《迷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号,1906年1月。
- [3]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 [4]林云陔的《唯物史观的解释》在《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第1张和第20号连载,算作2篇文章。
- [5]《文化书社社务报告》,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63页。
- [6]John Rusin,今一般译作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评论家,主张美术同劳动和社会生活相结合,倡导有计划地干预经济。罗斯金的名言“竞争的法则,常是死的法则。互助的法则,常是生的法则”,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影响很大。
- [7][9][22][24][28][35][79][87][94]玄庐:《竞争与互助》,《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
- [8]季陶:《俄国民族的特性》,《星期评论》第10号,1919年8月10日。
- [10]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 [11][英]皮尔逊著,季陶译:《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

(上)》,《星期评论》第5号,1919年7月6日。

[12]云陔:《唯物史观的解释(续纪念号)》,《星期评论》第20号,1919年10月19日。

[13]先进:《怎么样进化》,《星期评论》第11号,1919年8月17日。

[14]蓓玉:《侮辱女子之男女解放说》,《星期评论》第34号第2张,1920年1月25日。

[15]季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二)》,《星期评论》第25号,1919年11月23日。

[16]乐勤:《农工和食米》,《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九张,1920年5月1日。

[17]《报馆的排印工人告读新闻者》,《星期评论》第38号,1920年2月22日。

[18]转引自陈正谟:《现代哲学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7页。

[19][20][21][104][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41、13-14、12页。

[23]玄庐:《“人”与“物”》,《星期评论》第12号,1919年8月24日。

[25]季陶:《猎人会》,《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26]J. L. Lanessan,今译为拉纳桑或拉来桑,法国生物学家,其著作《生存互助论》在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纳入“百科小丛书·新中学文库”出版。

[27]季陶:《竞争与互助》,《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29][85]本社同人:《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30][46]季陶:《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31][42]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32][82]玄庐:《子孙主义》,《星期评论》第7号,1919年7月20日。

[33]廖仲恺:《革命继续的工夫》,《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第2张,1919年10月10日。

[34]陶孟和:《六时时间之劳动》,《星期评论》第52号,1920年5月30日。

[36]玄庐:《互助的好处》,《星期评论》第10号,1919年8月10日。

[37][38][74]季陶:《上海的同盟罢工》,《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3张,1920年5月1日。

[39]仲九:《香港机器工的同盟罢工》,《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4张,1920年5月1日。

[40]先进:《国民是不是应该分家的?》,《星期评论》第36号,1920年2月8日。

[41]仲九:《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星期

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43][47]季陶:《社会民主化的英国政治》,《星期评论》第4号,1919年6月29日。

[44]季陶:《组织工会第一层的注意事项》,《星期评论》第13号,1919年8月31日。

[45][86]参阅杨宏雨:《〈星期评论〉对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学术界》2020年第4期。

[48]仲九:《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星期评论》第9号,1919年8月3日。

[49]光佛:《女子解放当从男子解放做起(一)》,《星期评论》第22号,1919年11月2日。

[50]李人杰:《男女解放》,《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第6张,1920年1月3日。

[51]参阅杨宏雨、肖妮:《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星期评论〉关于女子解放问题的讨论》,《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2期。

[52]季陶:《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星期评论》第42号,1920年3月21日。

[53][65][80]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7张,1920年5月1日。

[54]《介绍上海工读互助团》,《星期评论》第40号,1920年3月7日。

[55]执信:《不可分的公理》,《星期评论》第16号,1919年9月21日。

[56][64]仲九:《我的人生观(下)》,《星期评论》第21号,1919年10月26日。

[57]仲九:《读孙少侯的忏悔文》,《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第4张,1920年1月3日。

[58]季陶:《上海的社会改造(上)》,《星期评论》第5号,1919年7月6日。

[59]T. T. S.:《马克思逸话一节》,《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第2张,1920年1月3日。

[60]玄庐:《新旧文学一个大战场》,《星期评论》第24号,1919年11月16日。

[61]玄庐:《对于教职员罢工的感想》,《星期评论》第32号,1920年1月11日。

[62][78]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63]季陶:《热社会与冷社会》,《星期评论》第30号,1919年12月28日。

[66][法]拉来桑:《生存互助论》,吴克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62页。

[67]先进:《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星期评论》第21号,1919年10月26日。

[68]汉俊:《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星期评论》第50号,1920年5月16日。

[69]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第48号

(劳动纪念号)第2张,1920年5月1日。

[71]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73页。

[72]李大钊:《“五一”May Day 运动史》,《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1张,1920年5月1日。

[73]梦麟:《实验主义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第4张,1919年10月10日。

[75]玄庐:《介绍“工读互助团”》,《星期评论》第29号,1919年12月21日。

[76][88]蒋作宾:《战后游历欧美的感想》,《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第5张,1920年1月3日。

[77]李怡:《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3-120页。

[8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83]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3页。

[84]马建标:《塑造救世主:“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89]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康文龙主编:《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2页。

[90]胡适:《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91]转引自杨奎松、董仕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3页。

[92]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5日。

[93]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编:《无政府主义批判》(下),中国人民大学1959年印刷,第93页。

[95]皮明麻:《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69页。

[96][98][100]《〈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俄文原本编者莱伯代甫序》,李存光编:《无政府主义批判——克鲁泡特金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第109、110、108页。

[97]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92页。

[99]巴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汉译本译者前记》,李存光编:《无政府主义批判——克鲁泡特金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101][102][106]巴金:《〈互助论〉中译本前记》,李存光

编:《无政府主义批判——克鲁泡特金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第84、84、85页。

[103]克鲁泡特金在《进化论》一书的引言中说:“这是一本论述互助法则的书,它把互助作为进化的一个主要要素来考察——它所考察的不是所有一切的进化要素和它们各自的价值”(〔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李平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4页)。克氏在“所有一切的”下面还打了着重号,这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导致生物进化的原因是多样的。

[10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

[107]仲九:《主义的研究与禁止》,《星期评论》第40号,1920年3月7日。

[108]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109]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3页。

[110]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111]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5-356页。

[112]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类似的说法在其《阶级竞争与互助》等作品中也有反映。

[113]《互助社的第一年》,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18页。

[114]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作品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37-46页。

[115]刘勇:《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再评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116]毕青松:《竞争与互助:清末民初进化论思想内涵的嬗变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65页。

[117]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44页。

[118]巴金:《〈克鲁泡特金全集〉总序》,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

[119]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72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